序

“上帝”让温州人发财

提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证明了以发展私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温州模式的强大生命力，而温州之所以能够率先冲破阻力发展私营经济，靠的是当地雄厚的创业文化。勇于创业的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鱼得水，终于成为“先富起来”的中国人！

温州位于浙江省的南部，中国黄金海岸线的中段，面积 10 560 平方公里，2001 年人口 722 万，辖鹿城、龙湾、瓯海三区和瑞安、乐清、永嘉、文成、平阳、泰顺、洞头、苍南 8 个市县。在中国的三百多个地级市和地区中，温州的人口不算最多，面积不算最大，但如果说到知名度，温州却已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同辈。改革开放不久，温州就被认为是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随着党和政府对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肯定，温州的私营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并继续展示着自己的强大生命力。

从 1978 年至 1997 年，温州全市的国内生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都已经翻了五六番。199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334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854元和浙江省平均水平 8428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402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10 元和浙江省平均水平 3948 元。过去，温州是浙江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区，现在，温州已是省内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的新兴工业区。近年来，尽管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某些地区的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温州的经济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2001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又比上年增长了 12% ，不仅高于全国，也高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

私营经济在温州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已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了 80%,整个工业产值中占了 90%。温州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是通过劳动者人人参与,积极发展私营经济,一切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为前提而取得的。温州人在谈到自己的致富经历时,除了说‘ 是党的富民政策让我们致富外 ”,还爱说‘ 是 ‘ 上帝 ’ 让我们发财 ”,这个‘ 上帝 ”,就是市场经济,确实;‘ 上帝 ’让温州人发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创造的发展经济的模式,主要有通过引进外资的‘ 三来一补 ’发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依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依靠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这三种模式,虽然都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没有哪一

种模式、哪一个地方，像温州这样经历过那么多的坎坷曲折。主要原因，是私营经济长期以来被视为国营经济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的专有之物，革命的对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温州模式被人议论纷纷，甚至被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随着温州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党的十五大以后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重新确立，温州模式不仅得到正名，而且被视为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很好途径，温州人成了成功致富的光辉榜样。甚至珠江三角洲和苏南地区这些一向具有自己独特经济模式的区域，以及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一向居支配地位的大城市，也开始讨论温州模式，试图通过温州模式走出自己的发展私营经济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确实证明了温州模式的强大生命力。近年来，讨论温州模式成长过程和相关理论问题的著作，一本本摆到了书店的新书架上，一篇篇相关论文出现在各类学术杂志上。这些著作和论文，便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我的这本小书，虽然也简略谈到了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但它强调的是温州人的勇于创业成功致富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谈谈温州的创业文化及其形成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最后和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从温州创业文化上，该学到点什么？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人的要求过好日子的强烈

欲望，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地区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建立在要求过好日子的强烈欲望基础上的创业文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文化是经济的发动机,经济的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造成的。温州值得各地借鉴的内容很多，最值得借鉴的，是它强大的创业文化。因此，在有关温州的书单中，增添这一本专谈创业文化的小书，或许还有必要。

第一章

温州人的“创世纪”

1. 越长越大的“资本主义尾巴”

提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活出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是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都无法压制的。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无所不在的时代，暗中包产到户，兴办家庭企业、地下工场，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虽然浙江省号称鱼米之乡，但浙江并非每个县都很富裕，在改革开放以前不少地区甚至还相当贫困，温州就是浙江省比较贫困的地区。1978年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只有0.53亩，大约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过少，农村的人多地少问题极其严重，存在大量的缺地少地人口。由于乡镇企业的数量相当有限，安排不了多少劳动力，因此农民普遍比较贫困。197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13元，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地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山区的泰顺、文成、永嘉等县，更属于浙江省内经济最落后的县份,即使到 1985 年仍然如此。1985 年浙江省政府发文对全省五个贫困县进行政策扶持，其中就有此三县。

农村经济不振，城市同样如此。 1976 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11.98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仅 5.6 亿元，尚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在浙江省当时的三个城市中，温州的城市工业不仅根本无法同杭州相比，也远远不如宁波市。 1983 年温州的工业产值还不及宁波市的三分之一，尽管两个地区的面积和人口总数相差不多。

耕地的严重缺少，使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1978 年，全市农村劳动力 188 万人,耕地总面积 19.33 万公顷，如果按每个劳动力耕种 5 亩计算，全部耕地只需要 58 万劳动力，其余的 120 余万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二，需要另找出路。然而，乡镇企业的落后，却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工业部门就业，人们只能守住可怜巴巴的一点耕地，脸朝黄土背对青天，过着贫困的生活。

农村如此，城镇也好不了多少。温州市区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几年已基本上没有招工，集体企业的职工数量也达到饱和状态，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在温州市区和各县的城镇，“就业难”都是令各级政府头疼的棘手问题。1978 年，平阳县的金

乡镇（现属苍南县）是一个不足 2 万人的农村集镇，镇上的失业青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有 3700 多人，占了总劳力的一半。镇领导曾被要求工作的失业青年团团围住，闹得不可开交，连吃饭的饭碗也被他们夺了下来。另一位镇领导上任的第一天，就碰到同样的麻烦。当地的失业青年出海报，要到镇委请愿，要求给他们安排工作。在温州的另一个县乐清，也发生过失业青年到县里请愿，把县机关食堂的饭都吃掉的事。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找生活出路，只好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外地谋生。这一现象，早在文化革命的初期便已经开始，后来愈演愈烈， 1978 年前已形成规模不小的浪潮。

在东南各省,大西北,大西南,甚至远到东北，人们都可以看到来自温州各县的手工业工匠。在最初的阶段，匠人们大多是一县一艺，平阳县和永嘉县的弹棉花匠（将棉花加工成棉胎），文成县的篾匠（用毛竹编织席子等器物），乐清县的补鞋匠，泰顺县的泥水匠（土石建筑），一时名闻各地。工匠们有的是结伴外出，有的是单独外出。他们云游各地，少有长期的固定住所。这些工匠，外地政府管不着，家乡政府又无法管，人们称之为“盲流”。文化革命中各地屡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这些人强制遣送回温州，但往往管理一松，他们又奔赴各地谋生。到了文革的后期，外出谋生的人数大量增加，不仅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有城

市的失业人口。他们从事的行业，逐渐演变为“五把刀子”,即菜刀(餐饮业)、剪刀(缝纫业)、劈刀(补皮鞋业)、剃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这些人走南闯北，在各地干一些当地人不愿干或者很少干的零活，卖一些当地人不愿卖的小商品，解决当地的‘吃饭难’、‘修理难’和‘做衣难’,借此赚钱养家糊口。除此之外，还有人在各地乞讨，在上海的车站或码头帮人排队、倒卖车票船票，等等。随着温州家庭企业的发展，推销家庭作坊小商品并为之采购原料的购销员也加入在各地奔波的温州人的行列，并逐渐成为主要部分。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外地谋生的温州人大约已达 10万人。

当一批一批温州人外出谋生时，很多的温州人重新拾起祖先的手艺，依靠比较简易的机器甚至手工，生产城市大工业不愿生产或很少生产的小商品。这种“地下经济”，早在文革前就已存在。例如，平阳县宜山区（后来属苍南县）的土纺土织，在 50 年代的统购统销中保存下来，60 年代得到大规模恢复，年产值达 370 多万元，1964 年‘社教’运动中被打了下去，文革中农民趁着天下大乱，利用边角废料又搞起了再生棉花和再生布，但到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土纺土织被迫再度转入地下。又如，瑞安县塘下区、莘塍区的机械工业 1949 年以前便有着较好的基础，普通机械的制造能力和技术力量较强。文革期间，一些人乘天

下大乱之机，乘机制造车床、牛头刨等低档机床以及各种低压阀门销往外地，打绳、织网等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也重新恢复，“地下工厂”盛极一时。但到了 70 年代后期的“一批双打”运动中，这些工厂统统都被打了下去。

这些家庭企业，尽管被视为“地下工厂”、“黑工厂”、“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再受到打击，但它们就像烧不尽的野草，历尽寒冬而不枯萎，一旦政府管理稍有不及便重新开工生产。到改革开放前夕，温州不少地方都有这种规模极小的家庭企业存在。不仅农村这样，城镇同样如此。在城镇中，除了国营工厂，还存在着许多规模较小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企业。虽然这种企业没有光明正大的“身份”，仍然有一些国家无法安排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子女在此就业。各地都有相当一部分的中下层干部，感到这些企业有助于解决当地的“吃饭”问题，因此，尽管上级政府一再要求割去这种“资本主义的尾巴”，他们仍然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干部由于与之有一定的经济利益，还暗中给以支持和保护。这种家庭企业和地下工场为了保护自己，也往往称自己为“集体企业”，挂靠在某个国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的下面，或者用村办、公社办的企业的名义，以免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打下去。实际上，这种“集体企业”不过“挂羊头卖狗肉”而已，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都是独立完成的，和挂靠的工厂或村、公社并无关系。

当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生活所迫，不顾政府禁令，到全国各地谋生、在家乡兴办家庭企业时，农业生产方面也出现“资本主义尾巴”。这主要发生在永嘉县，1975 年永嘉全县 77% 的耕地、三分之一的山场已被包产到户。

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活出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发展经济的决定性的最终的动力，来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都无法长期压制下去。温州人在国营和集体经济统治天下，计划经济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时代，暗中包产到户、兴办家庭企业、地下工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2. 抛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

提要：勇于创业，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已经成为温州人的共识。国营企业职工纷纷辞职，家庭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温州，温州的购销员走遍了全国，温州市场推动着温州的经济格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将党的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全会开过不久，温州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温州和安徽小岗村同时

成为我国农村最早包产到户的地区。1982 年 1 月，当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第一个 1 号文件下达时，温州已领先一步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我国，私营经济这种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形态，自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便失去了合法性，不仅已退出国民经济，而且作为“资本主义”而不断遭受无情的批判。当时，在全国像温州那样暗中还有家庭企业和地下工场等私营经济存在的地方，可以说极为罕见。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尽管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但由于受长期的“左”的思想的束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仍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而我国的理论战线一旦展开有关经济现象“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大多要将温州作为讨论的对象。就像温州人后来所回忆的，这些争论，都是“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参与争论的其中一方无一例外地要将温州作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各级政府对自发的私营经济的态度一开始往往是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反映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时紧时松。1982 年,温州市公安局和工商局根据上面的指示，抓捕了当时乐清县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八大王”，更加引起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的担心和恐惧心理，温州的经济发展速度趋缓。1980 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 31.5%,1981 年为 7%,1982 年更降到 -1.7%。铁的事实使温州的领导明白，在温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要想发展经济，除了发展私营企业，没有其他的出路。事实上，不仅 80 年代初的温州领导得出这一认识，在此后对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仍然存在争论的若干年中任职的温州领导，同样得出这一认识，并用自己的行动实践这一认识。正像后人所总结的"在那个十分独特的时期，每一位被调来温州的干部，都是怀抱着一种彻底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强烈的'政治使命'，而每一位到最后却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了温州模式的维护者和坚持者。"

1982 年底，温州市召开有 1200 余人参加的全市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让这些发展私营经济的领头人物戴红花，上主席台，市政府还组织敲锣打鼓迎送。市政府制定了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的具体政策，还无罪释放了乐清县的"八大王"。经营私营工商业不仅无罪，而且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的思想，已从平民百姓的思想深处，开始走向政府机关，变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公开语言。此后，温州市各级政府致力于为私营经济保驾护航，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文件。在当时缺乏对私营经济的全国性统一立法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性法规有效地发挥了保护温州私营经济向上发展有序运行的作用。

对于恐惧贫穷，力图通过发展私营经济改善自己生活的温州人来说，这种环境的改变，大有绝处逢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温州原来的地下企业、地下工场开始通过各

种方式，获得自己的合法身份，温州人被束缚的太久太久的创业和致富的强烈欲望喷发而出，无数的家庭企业，数以百十计的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在温州城乡冒出，以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温州模式开始形成。

从 1980 年开始，温州的私营工业、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1980 年全市登记在册的私营工商户不过 1844 户，到 1986 年增加到 111878 户，几乎增长了 60 倍，从业人员达到 22.6 万。

私营经济的增长，极大地改变了温州的所有制格局。在 1980 年的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占 31.5%，乡镇以上集体企业占 56%，村及村以下的私营企业仅占 12.5%。到了 1986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下降到 17.04%，乡镇以上集体企业上升为 56.96%，村及村以下的私营企业上升为 26%。商业部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显著。国营、集体、个体和农民集市贸易，在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1980 年分别为 37.22%、57.26%和 5.52%，到 1986 年已分别变为 27.7%、37.2% 和 35.1%，个体商业和农民集市贸易额已经超过国营商业。在社会商业零售网点中，个体户更是达到 90.9%，占了绝对优势。

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温州 80%的人口搞饭吃的落后局面，初步形成了农业、工业以及第

三产业综合发展的社会经济新格局。1979 年,全市农村 8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副业的劳动力只占 11%。随着家庭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1986 年,在全市的 267 万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分别占总数的 63.5%、19%和 17.5%。尽管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仍不及第一产业部门,但转移到这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已达近百万人,而在商品产销基地非农业劳动力高达 90%。在农村的 160 多万劳动力中,从事种植业的也只是近 125 万,即使这些人,除了一部分粮食种植大户,绝大多数也成了兼营工副业或农林牧副渔的兼业户。他们一般都是"农忙务农,农闲务副"。可以说,温州农村在 1986 年已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村工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

上述数字的变化,说说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

温州农村缺少工业基础,商业不发达,又远离工业发达的大城市,而且对外交通不方便,除了祖先留下的善于经营工商业的遗传基因,一切近乎空白。更何况,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对私营经济的禁忌尚未完全打破的时候,要发展私营工商业,道路之艰难可想而知。温州农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吃别人不能吃之苦,走别人不能走之路,紧密根据市场的需要,才得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商业经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不

妨看看平阳县金乡镇（今属苍南县）是如何走出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

改革开放前，金乡镇有 15000 多人,人均耕地 0.35 亩，只有两家国营工厂,100 多名职工,人多地少矛盾十分尖锐，迫切需要发展工商业。 1979 年，当全国高等院校将要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到金乡时，有人算了一笔账：以全国招生 40 万人计算，每人一枚校徽，总数就是 40 万枚，加上教职员工，可以超过 50 万枚。以每枚二角五分计算，业务额当在 12.5 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了不得的生意了。于是，镇上善于制作小五金的能工巧匠及时赶制出校徽样品，用信寄到全国各大院校试销。业务信一发，各校纷纷订货，金乡的校徽以质优价廉的优势打开了销路。

金乡人紧接着又瞄准学校需要的塑料红膜制品,生产学生证、毕业证书、借书证,进而又把红膜制品生产扩展到自行车证、户口册、荣誉证、房地产证，以及各种书、簿册的封面，等等。在销售校徽的过程中，金乡人获知学校和工厂需要塑料饭菜票，一些家庭作坊便生产塑料饭菜票和工厂代金券等硬塑片产品。不过二三年的时间，这几项产品就形成广阔而又牢固的产销基地，销售量约占了全国的 50%。这时，发端于校徽的铝质标牌生产，已扩展到自行车牌照、门牌、纪念章、领带夹、领章、帽徽、各种标牌等几百种品种。从 1986 年起，金乡镇又开始生产不干胶涤纶商标。经过

这样的扩展，金乡的家庭工业形成了铝制徽章标牌、塑片、红膜、涤纶商标等四类小商品，产品多达1500多种，产品走向全国，形成了粗具规模的工业经济。

金乡经营的这些小商品，因体积小重量轻，批量又不多，主要通过邮局流通。人们发信征订业务，又用包裹寄走产品。据说，在兴起后的6年中，金乡人共发出1.6亿封信，全国40万个国营、集体企业，平均每个企业每周便会收到一封金乡人寄来的业务信。人们总结金乡的发展道路，认为是当地人用一双手(即手工制作)、两条腿(即外出跑供销)、三分邮票(寄广告信的邮费)、四小产品，闯出了一条发展家庭工业的致富道路。

在农村面貌发生巨变的同时，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致富过程。

一位姓叶的企业家可能是较早抛掉铁饭碗、自端泥饭碗的人。叶先生是一个富于进取心不甘混日子的人，然而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工厂停产却使他无所事事。1975年，进入不惑之年的叶先生不想再混下去，也为了解决自己和别人子女的就业，第二年离开长期工作的工厂，下海办了一个企业。一开始的时候，困难重重，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厂房，但这些都让他克服了，终于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迈出了成功创业的第一步。不过，早期像他这样从国营部门主动下海的人并不多。1980年温州市区的无证个体商贩和手工业

户共 2588 户,其中,965 户是郊区和邻县进城的个体商贩和农民,1623 户是当地人。这些人,主要经营商业和服务业,很少从事手工业生产。而且,抽样调查表明,这些人的 90% 左右都是原来没有职业的人员,如待业青年、闲散劳力、嫁入城市的妇女、支边支农的倒流人员,以及残疾人、劳教释放人员,等等,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人数很少。可见,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而从事私营工商业的。

随着私营经济的日渐活跃和国营、集体企业体制弊病的暴露,私营工商业者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国营企业的大锅饭也使得相当一部分职工感到在厂里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有一些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职工主动放下铁饭碗,兴办自己的企业,或到私营企业工作。例如,创办平阳县建筑起重机械厂的企业家柳上淡,原来是平阳县镇办企业敖江机电厂的供销员,家中 7 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曾因家庭贫穷受过别人的无端冷眼,决心争一口气。1983 年春,他从外地接受一批卷扬机加工业务,但厂里设备简陋,领导因厂里没有资金增添设备,又无法搞新技术,打算放弃这笔业务。柳上淡不愿撕毁合同,要求厂里同意他承包一个车间,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用来生产卷扬机,但厂里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毅然离开镇办厂,找人合股办厂,生产小型卷扬机。平阳金乡的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